

## 魯迅與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的應對策略

陳子平\*

“挑戰—應戰”的文化思想研究敘述模式，似乎遭到8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的普遍質疑。許多學者都斥之為“西方中心主義”思想。其實，不論如何質疑和斥責，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的發展，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處在“應對”的狀態之中，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的發展和演變，正是面對西方文化思想強有力的挑戰與刺激所採取的應對策略及其轉變。只有在這種“應對策略”的應用及其轉變的文化思想背景中，我們才能看清和認識魯迅文化思想的現實性和針對性。

—

衆所周知，1840年以後，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打擊，中國社會經歷了從“器物引進—制度變革—文化思想改造”三個強烈的震蕩周期。戊戌變法以前，是大量引進西方先進的物質文明，“船堅炮利”成了中國朝野上下普遍神往的主流目標，曾被目為“奇巧淫技”的西方物質文明一時之間成為社會崇奉的時尚。但甲午戰爭打破了中國人的物質引進的美夢。號稱亞洲第一強的清朝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的悲慘結局，使有識之士警醒：再強大的“器物”，在腐敗衰朽的落后體制下，最終只能“落花流水春去也”。康有為、梁啟超奔走呼告的“變法”主張，恰逢其時，制度變革的要求日益高漲。然而，隨着“戊戌六君子”被斬首北京菜市口，康、梁倉皇出逃日本，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城，制度變革的嘗試最終在血雨腥風中被迫夭折。

文化思想改造的呼喚，正是在這樣慘烈的世紀之交成了時代的最強音。從梁啟超的“新民說”到“小說界革命”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蔚為大觀，文化思想改造一時成為有識之士執着探索的課題。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的發展沿着“改良群治”—“種族革命”—“思想革命”的軌迹運行，這是特定時代的“應對”策略及其合乎邏輯的轉變。

在“改良”與“革命”互相爭奪話語權、水火不相容之際，魯迅開始思考他的“國民性”問題。據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所載，他們“見面時每常談中國民族性的缺點”。

\* 中國蘇州大學 中文系 副教授。

在魯迅的視野中，“國民性”有着這樣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即“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麼”和“它的病根何在”<sup>1)</sup>。其實，有關“國民性”問題的思考，在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主張和嚴復的翻譯著作中，多少都或隱或顯地涉及到，即使是林紆翻譯的小說，也有時觸及到。如《黑奴吁天錄》序》中即有這樣的評說：

吾支那人奴隸性質，萌芽于秦，枝干于宋，充實蕃衍于明，故秦以後朝廷得而奴隸之，宋以後同洲異族得而奴隸之，明以後則天下五洲各國得而奴隸之，蓋理學八股之效，如是其彰彰也。<sup>2)</sup>

與此相比，魯迅的有關思考當然要系統深刻得多，但魯迅的思考真正意義並不僅限于此。

魯迅是贊同擁護“革命”的，在東京留學時就加入“光復會”，仰慕章太炎的革命豪情，一生都在為“革命”唱贊歌，就是明證。臨終前十天寫的《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還對章氏的“革命”精神依然流露出一往情深：

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于上海的西牢……考其生平，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sup>3)</sup>

從“種族革命”到“思想革命”，這是面對亡國滅種民族危難的必然的“應對”策略，但我們需要追問的是，“種族革命”和“思想革命”都是許多有識之士在特定時代設定的“應對”策略，那麼，魯迅的文化思想的深刻性表現在何處。

我們一向都以為，“思想革命”的深思，尤其突出的是對“國民性”問題的深刻把握，是魯迅對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的突出貢獻，90年代以來，有學者反其道而行之，認為“國民性”問題純屬是思想虛構，是特定時代編造的“神話”<sup>4)</sup>。大刀闊斧，一筆勾銷了魯迅崇尚的“思想革命”的價值。其實，上述兩種不同的闡釋，都有意無意地忽視魯迅在特定時代的“應對”視角。

突出強調“國民性”問題的價值，這當然把握住了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演變的軌

1) 參見《魯迅回憶錄》專著上冊，北京出版社，1999。

2) 林紆·魏易合譯《黑奴吁天錄》，上海，文明書局，1905。

3) 《魯迅全集》第六卷，第44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十卷版），1958，下同。

4) 參見王曉明主編《批評空間的開創》（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中劉禾的有關論文。

迹。把魯迅放在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明顯的邏輯軸線上，無疑突出了魯迅的“得風氣之先”和把握時代的命脈。但忽視了問題的另一面。“國民性”問題決不是一個孤零零的抽象的命題探討，而是有着強烈的現實針對性。把“思想革命”和“種族革命”割裂開來討論問題，就是沒能真正抓住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發展的“應對”性質。“思想革命”不能解決迫在眉睫的亡國滅種的民族災難，只有驚天動地的“種族革命”才能暫時“挽狂瀾于既倒”。但沒有“思想革命”，“種族革命”就會草草收場，流于形式上的成功，最終只能是傳統意義上的改朝換代。

全盤否定“國民性”問題的論者，無非是套用后現代哲學思潮中的一些流行概念，對“國民性”作了一次模仿性的純文字遊戲的“解構”而已。從后現代解構的意義上說，“國民性”固然是虛無和神話，但對它的“解構”本身又何嘗不是虛無和神話。因為論者所依據的“概念”·“邏輯”本身就是后現代哲學需要徹底解構顛覆的東西。面對“一切都是語言遊戲”的理論預設，闡釋什麼東西都是沒有意義的。要不是在這種“文字遊戲”的意義上來討論問題，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全盤否定“國民性”論者似乎把“國民性”問題看作是解決中國社會根本出路的手段和方案，因而覺得是不現實·沒意義的。其實，從“應對”的意義上來說，“國民性”問題的提出和探討，這決不是解決問題的手段和方案，而是“革命”的目標和方向。“種族革命”是手段，“思想革命”是目的；前者是標，后者是本。標本兼治，這才是魯迅對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的獨特貢獻。這種“應對”策略，不僅僅是一種暫時的“戰術”，而是帶有永久性的價值追求。因此，換句話說，“思想革命”不僅是根本性的革命，同時也是衡量任何“革命”的價值尺度。

從上述意義上來說，我們才能理解魯迅為什麼對辛亥革命頗為失望。因為雖然滿清王朝被推翻了，但阿Q依然是未莊裏的“精神勝利者”，辛亥革命不僅沒能拯救他的靈魂，反而把他送上了斷頭台。阿Q死了，但阿Q的精神依然充塞在中國的天地之間，中國社會依然如故：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之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我覺得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里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

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sup>5)</sup>

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

5) 《華蓋集·忽然想到(一至四)》，《魯迅全集》(三卷)第12-13頁。

季。6)

這是由“思想革命”衡量出的“缺失”，并不表明魯迅對“革命”本身的拒斥和告別。這正如他在黃埔軍官學校的演講中所說：

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自然也有人以為文學于革命是有偉力的，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文學總是一種余裕的產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sup>7)</sup>

對“革命”的強調，對“文學”的“弱調”，也并不表明魯迅對“思想革命”本身的懷疑和否定，而是顯出他對“應對”策略輕重緩急的審慎抉擇。

## 二

20世紀的上半葉，中國面臨的是亡國滅種的危險，在這樣的存亡絕續之秋，“種族革命”的呼聲此起彼伏，終於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爆發。“種族革命”一度時期與“光復舊物”相提並論。所謂的“光復舊物”其中即含有恢復漢民族的本來地位的意思，“種族革命”就意味着“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推翻滿清的專制統治。當然，辛亥革命后，倡導五族共和，並沒有實行“大漢族主義”。隨着日后對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強調和政治上的權衡，很少有學者提及魯迅的“漢民族本位”的文化思想。

突出“漢民族”的本位，這是魯迅思考“國民性”問題的立足點。在魯迅文化觀照的視野中，所謂的“民族性”即是“漢族性”，而決不是我們日后所遵從政治政策需要所稱的“中華民族性”。在日本留學期間，魯迅投身“種族革命”和思考“國民性”問題，底線都牢牢地限定在“漢民族”這個預設的“本位”上。這與當時的時代氛圍和思想背景一脈相承，這是無須掩飾的。即使在中華民國的治下，魯迅照舊以“漢民族本位”的觀念和思維方式來思考和探討“國民性”問題：

……蠻狃早到過中原，五胡也來過了，蒙古也來過了；同胞張獻忠殺人如草，而滿洲兵的一箭，就鑽進樹叢中死掉了。有人論中國說，倘使沒有帶着新鮮的血液的野蠻的侵入，真不知自身會腐敗到如何！這當然是極刻毒的惡謔，但我們一翻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浹背的時候罷。外寇來了，暫一震動，終於請他做主子；內寇來了，也暫一震動，終

6) 同上，第13-14頁。

7) 《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三卷)，第318頁。

于請他做主子，或者別拜一個主子，在自己的瓦礫中修補老例……<sup>8)</sup>

中國人的“修補老例”，是在“外族”的“野蠻侵入”的襯托中描繪挖掘出的，明確地顯示出了魯迅“漢民族本位”的視角和立場。

這種“漢民族本位”的立場，不是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一貫和持久的理念，從“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開始，到“別求新聲于異邦”，到“啓蒙者一鬪士一過客”角色轉換<sup>9)</sup>，魯迅始終沒有改變過“漢民族本位”的立場。直到1935年，魯迅還對清代學者俞正燮“歌頌清朝功德”頗為不滿。以一揭滿人對漢人的文化思想鉗制的秘密而後快：

但俞正燮的歌頌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說是當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壯年以至晚年的時候，文字獄的血迹已經消滅，滿洲人的凶焰已經緩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時的禁書，我想他都未必看見。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的著作的手段，就是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剷去之類也且不说，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却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頗盛之處，使天下士人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里面，也會經過很有些骨氣的人。<sup>10)</sup>

在魯迅的“歷史”意識中，他是自覺地把“異族”排除在“中國人”的“歷史”之外的，漢族與非漢族的界線涇渭分明，毫不含糊或勉強湊合：

中國人是尊家族，尚血統的，但一面又喜歡和不相干的人們去攀親，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從小以來，什麼“乾隆是從我們漢人的陳家悄悄抱去的”呀，“我們元朝是征服了歐洲的”呀之類，早聽的耳朵里起了老繭了，不料到得現在，紙烟鋪子的選舉中國政界體人投票，還是列成吉思汗為其中之一人；開發民智的報章，還在講滿洲的乾隆皇帝是陳閣老的兒子，……我是真怕將來大家又大說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孫。<sup>11)</sup>

這種民族的界線，有着深深的血淚和傷痛，當有人遺忘民族沉痛的血淚史時，魯迅總是以“算帳”的方式提醒國人：

8) 《墳·再論雷峰塔的倒掉》，《魯迅全集》(一卷)，第297頁。

9) 有關魯迅社會角色的轉變過程，請參看拙作《“過客”的悲哀》一文，載《江海學刊》，1989年第4期。

10) 《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余》，《魯迅全集》(六卷)，第143頁。

11) 《花邊文學·中秋二愿》，《魯迅全集》(五卷)，第454-455頁。

說起清代的學術來，有幾位學者總是眉飛色舞，說那發達是前代所未有的。……但說起來可有些躊躇，怕英雄也許會因此指定我是猶太人，其實，并不是的。我每遇到學者談起清代的學術時，總不免同時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却換得這幾頁光榮的學術史，這買賣，究竟是賺了利，還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數學家，到底沒有弄清楚，但我直覺的感到，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賠款來養成幾位有限的學者，虧累得多了。<sup>12)</sup>

之所以要執着于“漢民族本位”立場，這不僅僅自身是漢族人的緣故，更深的理由應該與魯迅在文化思想上的審時度勢有關。

要免遭“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的厄運，我們只能從中國本土現有的最高起點起步，才能重新踏上新的文明之途。而我們現有的最高起點，只能是漢民族所固有的東西。

……我們為什麼能夠同化蒙古人和滿洲人呢？是因為他們的文化比我們的低得多，倘使別人的文化和我們的相敵或更進步，那結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們倘比我們更聰明，這時候，我們不但不能同化他們，反要被他們利用了我們的腐敗文化，來治理我們這腐敗民族。他們對於中國人，是毫不愛惜的，當然任憑你腐敗下去。現在聽說又很有別國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哪里是真是尊重呢，不過是利用！<sup>13)</sup>

雖然對於漢民族的文化(即中國舊文化)有清醒的估價和批判，但這是20世紀中國文化發展必須立足的土壤，“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這是對現實清醒的把握和抉擇。

遙想漢人多少囚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束，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不算窮，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駝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意……<sup>14)</sup>

對漢民族曾經有過的輝煌和魄力的批判性的贊嘆，多少顯示了魯迅對漢民族文化未來的信心和希望。這是“漢民族本位”得以強調和突出的重要依據。

“漢民族本位”立場的選擇，也與漢民族文化對西方人的魅力不無關係。魯迅曾經引用過日本作家鶴見祐輔的隨筆集《思想·山水·人物》中《北京的魅力》一文里這

12) 《花邊文學·算帳》，《魯迅全集》(五卷)，第416頁。

13) 《老調子已經唱完》，《魯迅全集》(七卷)，第424頁。

14) 《墳·看鏡有感》，《魯迅全集》(一卷)，第300-301頁。

樣一段話：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里，一面深思這對於外人有着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經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里雖然說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力于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sup>15)</sup>

雖然以批判的眼光，來分析外國人對漢民族“魅力”的贊嘆，但西方人惡意或善意地對漢民族文化固有“魅力”的贊賞，也多少影響了魯迅對“漢民族本位”立場的選擇。漢民族固有的“魅力”和“同化”能力，當然有批判和遭人唾棄的地方，但從“應對”策略上來說，它一經更新改造，必將成為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發展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 三

收入短篇小說集《吶喊》中的《一件小事》，總時常為論者不屑道，很多人直截了當地認為這是魯迅的“敗筆”。<sup>16)</sup>但在魯迅的心目中，“一件小事”却是人生的一種對照和依靠：

這事到了現在，還是時時記起，我因此也時時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幾年來的文治武功，在我早如幼小時所讀過的“子曰詩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獨有這一件小事，却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sup>17)</sup>

在這裡重要的不僅僅是，在車夫面前所顯示出的知識者靈魂的“不潔”和自私，而更重要的是，作家“立場”的選擇和確立，為人生的文學，“平民文學”，執著和固守的應該是“民間”立場。這是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發展又一策略性的選擇和設計。

對“民間”的借重與依靠，這是滿清王朝在覆滅前的最後策略，義和團運動的急劇升溫，最終火遍北京城，就是清王朝公開地對“民間”所作的政治上的利用。但這一利用，不但沒能使滿清王朝苟延殘喘，反而加速了它的崩潰。這是愚昧虛驕的清王朝統

15) 《墳·燈下漫筆》，《魯迅全集》(一卷)，第313-314頁。

16) 最早持此種看法的是成仿吾，他稱《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隨筆”，見他的《〈吶喊〉的評論》·《創造季刊》，1924年1月。

17) 《吶喊·一件小事》，《魯迅全集》(一卷)，第45頁。

治者所始料不及的。義和團最終成爲清王朝的政治犧牲品，這也不足爲奇。愚昧與愚昧相遇，只能導致更大的愚昧和荒謬。

義和團運動的失敗，並沒能阻止和打消一些有識之士對“民間”的重視和希望。早在1903年，《中國白話報》在上海創刊時，白話道人就在《發刊詞》中推崇“不讀書的英雄”：

現在中國的讀書人，沒有什麼可望的了！可望的都在我們幾位種田的·做手藝的·做買賣的·當兵的，以及十幾歲小孩子·阿哥·姑娘們，我們這一輩子的人，不知便罷，倘然知道了天下的大勢，看透了中國的時局，見得到便做得到，斷斷不像那般讀書人口是心非，光會說大話做文章，還要天天罵人哩……我們不讀書的這輩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來，着實厲害可怕得很。(18)

“不讀書的英雄”和“讀書人”相比，“不讀書的英雄”的優秀“品質”就被凸顯出來。魯迅首先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贊美車夫的，特殊的“智識階級”（“讀書人”）與“車夫”們果敢·堅決·不自私相比，却是慚愧的另類。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魯迅有這樣形象生動的描繪：

它却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19)

這裡似乎刻畫的是叭兒狗的形象，但却又是特殊的“智識階級”的象徵性的概括。魯迅對特殊的“智識階級”採取的是徹底決裂的態度和揮手告別的姿勢：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爲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脚。萬一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伎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面目，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只要誰露出真價值來，即使只值半文，我決不敢輕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20)

與對特殊的“智識階級”持徹底的批判和決裂的態度相反，魯迅對“民間”却充滿着

18) 引自《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典(1897-1929)》，第66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19) 《魯迅全集》(一卷)，第353頁。

20) 《華蓋集續編·我還不能“帶住”》，《魯迅全集》(三卷)，第175頁。



溫情和眷戀：對“車夫”的“仰視”；對“故鄉”滿懷着憂郁和悲涼的情思，尤其是“讓閩土成爲自己心底充盈的深情”<sup>21)</sup>；對“社戲”的懷念和對雙喜·阿發·六一公公等的深情描述；對“無常”和“女吊”的“唯美”般地謳歌和贊美……這些都明顯地表露出魯迅對“民間”立場的公開選擇和執着。

“民間”當然不是淨土，“下等人”也有“轉向”和“勢利”的時候，魯迅對“民間”有清醒的估價和認識：

至于希望中國有改革，有變動之心，那的確是有一點，雖然有人指定我爲沒有出路——哈哈，出路，中狀元么——的作者，“毒筆”的文人，但我自信并未抹殺一切。我總以爲下等人勝于上等人，青年勝于老頭子，所以從前并未將我的筆尖的血，洒到他們身上去。我也知道——有利害的時候，他們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頭子差不多了，然而這是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之下，勢所必至的事。對於他們，攻擊的人又正多，我又何必再來助入下石呢。所以我所揭發的黑暗是只有一方面的，本意實在并不在欺蒙閱讀的青年。<sup>22)</sup>

即使如此，魯迅依然執着于“民間”立場，特別強調中國文化思想發展與民衆的關係。1930年9月17日，在“左聯”爲他舉行的慶祝50壽辰的紀念會上，魯迅就批評了文藝界脫離工農，希望文學青年到工農中去。<sup>23)</sup>他依然贊美“中國的老百姓”：

誠然，老百姓雖然不讀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絕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游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被閉于城外，使受凍餒，“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肌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昏愚的呢，被愚弄誑騙到現在，還明白如此。<sup>24)</sup>

“民間”不僅有着與特殊的“智識階級”和“上等人”有別的“下等人”，而且也充斥着清新·質朴·剛健的氣息。這是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轉變生長的土壤，沒有“民間”的培植和護養，再先進的文明都與中國無緣。

要論中國人，必須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肪所誑騙，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無，狀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爲據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sup>25)</sup>

21) 張承志《致先生書》·《中華散文珍藏本·張承志卷》，第59-6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22) 《三閑集·通信》，《魯迅全集》(四卷)，第77頁。

23) 參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典(1930-1965)》，第29頁。

24) 《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至九)》，《魯迅全集》(六卷)，第350頁。

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發展的事實證明，我們依然沒能堅守住“民間”立場，沒能真正從“地底下”讓先進的文明之種生根·開花·結果。遺落了“民間”，也就意味着放棄了腳下的大地。中國人的根在“地底下”，在“民間”，中國人的“自信力”也應在此尋找歸宿。這就是魯迅為20世紀中國文化思想發展選擇的“民間立場”帶給我們的最大啓示。

### 【參考文獻】

- 王 瑤 《魯迅作品論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錢理群 《心靈的探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  
汪 暉 《無地彷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  
林賢治 《人間魯迅》，廣州，花城出版社，1995  
王曉明 《無法直面的人生 — 魯迅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  
皇甫積慶 《情結·文本 — 魯迅的世界》，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7  
樂黛雲主編 《國外魯迅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  
朱 正 《魯迅回憶錄正誤》，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  
李澤厚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李澤厚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李澤厚 《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  
夏志清 《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  
王曉明主編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  
陳鳴樹主編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 【韓文提要】

20世紀 中國文化思想的 발전과 변천은 西方文化思想的 강력한 挑戰과 자극에 직면하여 채택한 對應政策과 그 變化라고 할 수 있는데, 이러한 “對應策略”의 활용과 변화된 문화사상배경 속에서 우리는 비로소 魯迅 文化思想的 現實性과 對應性을 명확하게 인식할 수 있다.

“種族革命”과 “思想革命”은 亡國滅種이라는 민족의 危難에 대처했던 필연적인 “對

25) 《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魯迅全集》(六卷)，第92頁。

應” 정책이었다. “對應”의 의미로 말하면 “國民性”問題의 제기와 연구는 결코 문제해결의 수단과 방안이 아니라, “革命”의 목표와 방향이다. “種族革命”은 수단이고, “思想革命”은 목적이었다. 전자는 부차적인 것이고, 후자는 본질적인 것으로, 부차적인 種族革命과 본질적인 思想革命을 조화롭게 兼治한 것이야말로 魯迅의 20世紀 中國文化思想 발전에 대한 독특한 공헌이었다.

“漢民族”中心을 부각시키는 것, 이것이 魯迅이 “國民性”에 대해 思考했던 관점이었다. 文化를 바라보던 魯迅의 시선 속에서 “民族性”은 곧 “漢族性”이었던 것이다. “漢民族 中心”의 입장에 집착한 것은 魯迅이 文化思想上에서 時勢를 잘 관찰했던 것과 관계가 있었다.

魯迅은 특수한 “智識階級”에 대해서 철저한 批判과 斷絶된 태도를 견지하고 있었지만, 이와는 반대로 “民間”을 대할 때는 溫情과 애정이 충만하였다. 魯迅은 물론 “民間”에 대해서 분명한 인식과 평가를 하고 있었다. 그러나 그는 여전히 “民間”의 입장에 서기를 固守하였다.

### 【主題語】

魯迅 20世紀 中國文化思想 應對策略